第一章

人神合一的修身智慧

印度"神"在现代的魅力

"东方是精神的,西方是物质的",尽管人们对这笼统的结论争议颇多，但信的人还是不少。许多西方人向往东方，赞美东方文化，这也是实情。叔本华（1788—1860）在读了《奥义书》后,激动地说:"在这部书的字里行间,到处充满了明确而彻底的和谐精神，每一页都向我们展示了深刻的、基本的和崇高的思想。"马克斯·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在精心研究印度后，写了《印度，它能给予我们什么教诲》的专著,他感叹相对西方文明而言,印度文化才是意义深远的。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在《西方的没落》中说，欧洲文化正处于没落时期。这结论强烈震撼了西方人的心。凯瑟林（Nermann Keyserling，1880—1946）给苦闷和迷茫中的西方人带来了新希望，他在《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中对东方智慧充满了美好憧憬，并以自身的感受向西方人推荐东方。因此 20 世纪以来,那些为逃脱压抑、吵闹、畸型的西方社会的避世者，纷纷涌到印度去寻找宏福和内心的宁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以修复遭受创伤的心灵。

物质富裕的西方人大批涌来,这无疑对于‘精神富有’和“物质贫乏”的印度的宗教尊师们带来了财运。

贾拉尼就是这样一位善于捕捉‘财’机的老手。他是印度教的一位宗师，他的寺庙位于浦那。数以千计的西方人为了寻求精神寄托，不远千里纷纷自来入教。在这类人中绝大部分属中产阶级，尽管没有一掷千金的实力，但他们的到来，使得寺庙及附近城镇的面貌大变,呈现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神”带来的财源主要通过以下若干渠道流来。

一、贾拉尼的寺庙大院尽管占地仅三亩,但在现代扩音设备的帮助下，听经信徒的容纳量很有弹性，常有 3000—5000 人,有时甚至可达 1 万之众；而据说费拉尼在全世界的信徒已有百万以上。西方来者要吃五谷肉食，要有栖身之地，于是各类餐馆纷纷开张，原有的一些房屋经过改建和装饰，也变成了旅社。这就‘以点带面’,一个寺院养活了一片。

二、入寺院修道当然学杂费不可少。贾拉尼还规定信徒必穿修道服,于是西方人脱下牛仔、西装,在浦拿街上低价抛售，然后以数百美金购入不值一根领带钱的桔黄色长袍，因为穿上‘桔黄色装束,表明他们正准备投身未知世界’。当身穿清一色修道服的信徒们呼拉拉坐下一片时，颇像是足球场内荷兰队的拥趸（因荷兰国家队的队服为桔黄色，拥趸们也穿此色服装来加油助威),不过他们决不大声喧闹。

三、贾拉尼是神化般人物,有着白色络腮胡子,眼睛虽小但炯炯有神。每当面对寺院中一大片桔黄色时，他总是满面红光。贾拉尼每天早晨布道，一讲长达几年。入场费收入十分可观，这为他的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为了让众信徒更好铭记‘东方精神’,为了让他们能方便地‘温故而知新’,贾拉尼的‘工作班子’把布道内容编成书和磁带。贾拉尼的杰作堪称巨著，共达 336 本,磁带长达 4000 小时。有位虔诚信徒日以继夜计数,查核共有 4300 万词组成！磁带和书都放在寺院商店出售，定价高于同等物品的几倍。对于修道者来说,他们不是买,而是‘敬请’宝书和宝带,因此价格不是主要的,他们不就是为了‘东方精神’而跋山涉水的吗？据估计，单是这一项的营业额，每年贾拉尼的财库中就可净增 400 万美元。布道的最后阶段是通过沉默来作宣讲，那是“默默的,心对心的交流,因为最高真谛主要取决于悟性”。这最后的无言阶段,大约进行了 10 来天，这无声时刻也制成了磁带，照样出售。然而,也许是编辑的水平太有限,这‘沉默’终于没有编成书,因此第 337 卷一直没有问世。据贾拉尼手下人宣传,‘敬请’书及磁带应配齐全套,这不仅牵涉到‘集邮式的效应’,而且更主要是精神和虔诚,因为缺掉一册,也许几年的修行就会功亏一篑。

五、修道者是必须劳动的，这类劳动当然是无酬奉献。信徒们在寺庙的手工作坊中，编织袜子，熬制肥皂。尊师告诫信徒,要修得真谛必先穿上这种袜子(当然也是桔黄色的),这似乎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中国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肥皂就更重要了,因此冠以‘神’字,称为‘神皂’。因为要洗尽世俗的一切污垢，全赖此皂。令人费解的是，劳动者制造出的这些产品须全部上缴寺庙，然后放在寺庙的商店里一并出售给这些生产者。这“产销一条龙”的买卖方式看来也是一绝。

让我们来看一下如贾拉尼等一类圣哲是如何生活的，这大概有助于我们领悟“神”对他们的青睐以及宗师们“精神变

物质”的神通。

贾拉尼的白色长胡须配上一件拖到脚踝的白长袍,俨然是典型的印度圣哲装束。他就是以这样的外貌出现在每天早晨约一小时的布道会上。他不居住在寺院,另有依山傍水的豪华邸院。每天从宫殿般的居宅赶到布道的寺院,他照例乘坐最新型的‘罗尔斯一罗伊斯’轿车代步。据报道,就在贾拉尼作完“沉默”布道的第二天,他就坐着头等舱飞往美国。他在西雅图、洛杉矶和纽约均有着可观的产业和商场,并且在上述地区有着幽绿环抱的现代化私人别墅。贾拉尼的专一嗜好特别强烈,他在美国共有4辆汽车,全是清一色的‘罗尔斯一罗伊斯”车,所以他在企业、商场和银行之间穿梭往来时,也派头落落。顺便说及,他在印度的事业并不因他的出巡而中断,此时在他讲道的椅子上,放着他的一张巨大像片,成千虔诚信徒在照片前默默跪着,贾拉尼的讲道通过‘索尼’录音机仍余音绕绕。商店里除了继续供应尚未售完的布道著作和磁带外,此时他的肖像大为走俏,要“敬请”到这位圣贤亲手签名的一部大型影集,则需掏出500美元。

另一位宗师名叫穆鲁塔,他是瑜伽冥思帝国的头头,总部设在离孟买100公里的群山中,分部遍及印度其他地区,甚至远达澳大利亚、美国。穆鲁塔的产业以百万美元计数,在全世界有150万信徒,每年的捐赠足令他高枕无忧。穆鲁塔没有“罗尔斯一罗伊斯”汽车,他爱好的是‘林肯—大陆’牌,并且特别喜欢那种深蓝色的豪华型三排座。孟买五星级饭店中有他的长期包房,因为他时常去那儿监督他的产业,当然也出入那儿的几家大银行。孟买治安不佳,凶险莫测,所以他总是雇有好几名保镖。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孟买总是西装革履。然而他

在群山中的寺庙讲道时，总是身穿粉红色丝绸短袍，人们能一眼瞥见他神圣的膝盖，这是另一付印度圣哲的打扮。穆鲁塔滔滔不绝的口才决不亚于贾拉尼，他在教导信徒“摆脱知识的毒爪”时，一连讲了15个星期。在一次传教中，一名加利福尼亚来的青年信徒，竟旁若无人地大声啜泣，继而号哭声如雷，人们一致认为，他卷入了穆鲁塔师尊的能量场，已身不由己。这位瑜伽导师讲道时不喜欢录音，但他有录像的癖好。所到之处，几台“尼康”摄像机总不停歇。因此他的布道书籍是与录像带配套供应的。“看着他的尊容，聆听他的教诲，细细品味字里行间的含意，我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一位以前的德国计算机专家如是说。

容纳多教的智

印度历史上多次出现各宗教并立的时期，如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印度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及各种外道（如顺命外道及邪命外道）并存；而且我们在印度古代历史上很难发现大规模宗教战争的事例。

这与欧洲的情况大相径庭。在西方历史上，我们常常发现宗教抗争，这不可避免导致政治冲突和军事冲突。如西方的诸多宗教战争，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残酷迫害，十字军东征，等等。诸如此类的情形在印度从未出现过。

这多教并存，和睦相处的局面之所以出现，与各宗教的领袖和历代各国王的明智策略是分不开的，这或许也算得印度的治国或治教之道。

释迦牟尼讨厌“各执己见”的无休止争论，他指责这类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论是不道德行为。佛陀自己从不参与这类争辩，并认为这些争论对于‘悟道’是毫无意义的。他‘告诫修行者要超越一切‘戏论’(与实现宗教目标毫无意义的争论)”。他虚怀若谷地主张：不要一味坚持自己的教义才是“唯一的绝对真理”，否则就是“不明智’和‘顽固不化”,他在这方面已走得很远,甚至承认其他诸教诸学都有存在的意义，认为“只要人们相信一种学说，这学说必然存在着一些理由。”

或许另一历史事实可以作为佛教宥和精神的佐证。佛教遍布亚洲各国，却很少与当地的民族信仰惹起摩擦。乡土传统与其说遭到佛教的毁坏，不如说是与佛教融为一体。最终，佛教往往与当地的信仰融合，并给予这土生土长的信仰以哲学基础，这在中国的汉地与西藏、在日本及东南亚的历史上，都得到了证明。

耆那教的创始人摩哈维拉主张‘道理’的相对论,他努力证明对一般事物给予相对变化的判断是可能的。这一主张用于宗教，自然使一些教义争端变得毫无意义了。金月（1089—1173)是耆那教的一代大师,他说“:争论会产生妒忌,因为一派坚持而其他派别反对。至于耆那教则不然，他们宣传无教条和无争论,因为他们承认‘道理’的各种教义”:(《六十三完人传》)

婆罗门教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外道教理在婆罗门教中也有立足之地。吠檀多派视“普遍自我”(Atam)为唯一，它认为各派哲学的观点，无论怎样错误，也不管怎样异端邪说,都可包含在吠檀多的‘普遍自我’的理论中。该派哲学家甚至到了这种地步，他们认为那些异端邪说也是“普遍自我”的表现形式，认为它们即使本身不完整，也具有部分的真理

性。按照婆罗门教与印度教承上启下的大师商羯罗的说法，“一些人承认二元论，并坚持自己学说的看法……。然而吠檀多派学者(尽管是‘不二论’者)与这类二元论者没有什么理由非要闹得不可开交。”商羯罗把吠檀多学说和其他各类学说比拟为身躯与肢体的关系，并着重强调它们的一致性。

鉴于一切异端说都有存在意义的立场，中世纪的印度哲学家（请注意，在印度的思想史上，每一位主要哲学家都各自信仰正统的婆罗门教、佛教和耆那教，都属其中一个宗教教团的成员。当然唯物论和怀疑论者除外，但它们在印度的作用是短暂的，没有在历史进程中扎下根）曾试图建立“世界诸哲学体系的哲学”,或‘系统的世界观学”。

历代帝王的态度,也为多教和睦共处起了重要作用。印度的一代天骄阿育王皈依了佛教，并奉佛教为国教，但他对其他各教并不排斥。他在摩崖立诏，要“尊敬一切宗教的出家者和在俗者”,希望‘每一宗教的每一信徒都能安居一处”。在另一处岩谕中,阿育王诏令天下“:在每个场合,人人应尊重他人的教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加自己教派的影响和有益于他人的教派，如不然，则削减了自己教派的影响并有害于他人的教派——所以和平友好要予以赞扬，以便人们可以听到别人的原则。”(塔帕尔著:《阿育王与孔雀王朝衰落》)

尽管羯陵伽国王卡罗毗拉对耆那教有着炽热感情，但他仍被称作‘敬重一切宗教的人”,许多寺院、神殿在他统治时得到修缮。作为生于乱世的他，虽有一些征国掠地的军事行为，但没有迫害过任何宗教的教徒。

在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国王统治期间,佛教大盛,召开了“第四次佛教徒结集”。会后国王派遣使团去中亚和中国传教。

尽管他对佛教虔诚笃信，但他也保护其他各宗教的自由发展。例如，在他统治期间，王朝铸造了许多刻有神像的货币，这些受尊崇的神像出自各宗教，不仅有土生土长的印度教神像和佛教神像，而且还有希腊神像和琐罗亚斯德教神像。

在印度历史上又一“黄金时期”——笈多王朝统治时，国王们对于各宗教都采取宽容宥和的态度。在旃陀罗·笈多二世即‘超日王’统治时期(375—415)，中国的求法僧法显正好访问印度(405—411)，他收集佛教的写本和文献，研究印度的寺院。在其访印后撰写的《佛国记》中，他把这个国家描写成是各教和睦和布满幸福的乐园。笈多王朝以后，当戒日王统治印度主要地区时，玄奘到了印度，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我们也看到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都得到了广泛支持。

穆斯林入主南亚以后，一代明君阿克巴大帝（1556—1605)甚至进行了融合伊期兰教和印度教的改革。他取消对印度教的征税，允许印度教教徒进行偶像崇拜，甚至同意印度教封臣穿传统衣服入朝。他成立的宗教称作“圣王教团”(Din Ilahi)，意为以王为中心，万教在下，每一教都可存在。即便大众信仰的‘太阳崇拜’，他也一并纳之。

当然，印度诸教和睦共处局面的形成，还有着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原因，但这些宗教和政治领头人的明智，确实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苦行 耆那教的独特智趣

耆那教是印度的几大宗教之一，它大约产生于公元前 6 世纪，2000 多年来尽管风云变幻，它一直稳步发展，延续至

今。初创阶段，在婆罗门教强盛并主宰天下，佛教又同时崛起并称雄一时的环境中，耆那教要生存、要发展，并一直稳稳维系下去，它必然有一些过人的精明处。我们在它的教义中不难看到许多明智的、标新立异的高招。

耆那教以“永恒的宗教”标榜自身，以显示本教的源远流长。耆那教实际奠基者大雄(悟道前名筏驮摩那)仅称为第 24 祖,在他之前已排位有 23 祖，并且各祖之间的年代相距甚远，前后几乎达几万年。婆罗门教几乎不谈及自身宗教奠立前的教主世系。佛教尽管在释迦牟尼前已有若干佛（如有的信徒说有 7 佛,少数信徒认为有 12 佛)的说法,但各佛的承袭关系不甚明了。耆那教则不一样，它不仅有详细的世系表，而且为了令人更信服，还赋予每位祖师不同的名称、色彩和旗帜。如第 1 祖阿底那陀或称勒舍婆那陀的吉祥色为金色，以公牛为旗帜;6 祖名波特马巴罗波,尚红色,标帜为红莲;19 祖的名谓是摩利那陀,尚金色(天衣派)或尚蓝色(白衣派),标帜为水罐；23 祖名巴湿伐那陀，尚蓝色，他的旗帜是头上有 7 蛇盘绕并安坐在蟒身上。而 24 祖筏驮摩那身为金色,以狮子为旗帜。其他各祖尚色各不相同，标帜也各异，但大多为动物，如猿猴、马、鹿、蛇、山羊、水牛、乌龟、公猪、狮等,少数用雷电、新月等。试想公元前 6 世纪,大概人们对氏族公社的图腾记忆犹新,有的偏远地区大概图腾还历历可见，因此尚色和标帜的出现是有意识的。它们对于耆那教的创立及传教不无益处。德·恰托巴底亚耶在《印度哲学》中谈到耆那教各祖师都有“清晰的图腾标志 牛、象、马等等。这使我们可以想象作为耆那教来源的流行的原始信仰。我们将看到，耆那教在这个国家的长期生存历史中，原始成分构成了它的基础。”因此借用图腾形式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传教，当然可以显示它的悠久历史和坚实基础。

耆那教的基本教义为“七句义”,即“谓命、无命、漏、缚、戒、灭、解脱”。这大概与印度其他各大宗教在某些方面有类同之处，但耆那教获得解脱的最佳途径则属别出心裁，它十分强调禁欲和苦行并几乎趋于极端。佛教有渐悟说（通过几世积善而悟道成佛）和顿悟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一例），还有念佛往生净土（即念“南无阿弥陀佛”便可死后生于净土乐园）说等，这些修行从形式上看似乎较宽松些。虽然佛教也倡导禁欲和苦行，但强调的程度决比不上耆那教。因为佛典中对于耆那教的苦行方式有大量记载，佛学修行者似乎对这些苦行方式有一种惊叹感；换言之，如果这类苦行方式在佛教中司空见惯，他们大概就不必费心费力，一一予以记叙了。

如《长阿含·得形梵志经》记载：“不食鱼、不食肉，不饮酒。……或食饭汁，或食麻米，或食穊稻，或食牛粪，或食鹿粪，或食树根、枝叶花实，或食自落果……以无数苦，苦役此身。”（《大正藏·一卷》）

《杂阿含经》记载：“彼自害者，或拔发，或拔须。或常立举手，或蹲地或卧灰土中，或卧棘刺上，或卧杆上，或板上，或牛屎涂地而卧其上，或卧水中，或日三洗浴，或一足而立，身随日转，如是众苦精勤有行。”（《大正藏·二卷》）

《大唐西域记》的一些记载也谈及了耆那教的苦行：

“窣堵波侧不远，有白衣外道本师悟所求理初说法处，今有封泥，傍建无祠。其徒苦行、昼夜精勤、不遑宁息。”（《大唐西域记·卷三·僧诃补罗国》）

“诸外道修苦行者，于河中立高柱，日将旦也，便即升之。一手一足，执柱端，蹑傍杙。一手一足，虚悬外申，临空不屈。延

颈张目,视日右转,逮手曛暮,方乃下焉。若此者其徒数十,冀斯勤苦,出离生死,或数十年未尝懈息。”(《大唐西域记·卷五·钵逻耶伽国》)

实际上耆那教的苦行戒律繁琐、严明,对教徒衣食住行都有近似苛刻的规定,而宗旨毕一,具以折磨肉身为目的。

耆那教另一标新立异的修行便是‘天衣派’,他们认为‘戒私财’应去掉一切东西,以天为衣,以地为床,连衣服也不要。还有的耆那教徒认为衣服是桎梏,不应锁住神圣的身体。所以信徒们便光裸裸地行走于世上了。

“毗布罗山上有窣堵波,昔者如来说法之处。今有露形外道多依此位,修习苦行,夙夜匪懈,自旦至昏,旋转观察。”(《大唐西域记·卷九·摩揭陀国》)

“天祠百余所,外道万余人……或断发,或椎髻,露形无服,涂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大唐西域记·卷七·婆罗痆斯国》)

或许有人会说,竭力提倡禁欲和苦行,似乎与人的本性有所违逆,这样与扩大传教的目的不是适得其反吗?这对于中国和日本等注重现实的民族大概可以这么说,但对于有着根深蒂固宗教传统和喜好虔心修行的印度人或许更能吸引人。

从心理上说,标榜极端,有时反而能吸引一部分追求的人,据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有追求反常规倡导的心理趋向,或许耆那教的聪明正在于掌握了人的‘逆反心理’。

事实上,耆那教的标新立异确实受到了印度人的欢迎。大雄去世时,耆那教已拥有教徒527000人,并在以后有所扩展。公元7世纪中叶,耆那教已传播全印度,至今信徒仍不少于300万。再者,不仅印度平民,而且有些君主,他们或者是虔诚

的耆那教信徒，或者是耆那教的庇护者，阿阇世是古代印度北方最强国家之一的摩揭陀国君主，他与大雄是同时代人，并且也是耆那教的庇护者。乌陀耶是阿阇世的儿子，他是耆那教的虔诚信徒，曾在华氏城中心建造雄伟美丽的耆那教寺庙。孔雀王朝的开创者旃陀罗笈多在晚年时脱离王位，出家为耆那教苦行僧，并遵行耆那教的传统方式，以活活饿死的极端行为结束了自己的余生。

以幻为真弘扬教说

印度人为弘扬各自的教说,可谓用足了脑筋,其间的思想火花五光十色;“幻”大概就是其中光亮的一闪点。

日本学者富永仲基是18世纪的一名很有个性的自由思想家。他在仔细考察了印度思想后,用‘幻’来论及印度人思维的一种特征，并指出这是他们弘扬教说的一种手段：“印度的风俗对‘幻’甚为偏好,这恰似汉人好‘文’凡欲设教说道者,皆必遵‘幻’道以进,否则无以取民信。”他还说:“印度之学实是以‘幻’济道,苟由此进,否则民将不从。”

他的这段评论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翻阅印度宗教圣典，看到其中许多幻怪之说正被巧妙地用作教化民众、激发宗教热情的手段。

《华严经》是佛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它与《法华经》一样,常被奉崇为最高圣典，在中、日等国影响尤大，两国佛教都立有以《华严经》为基础圣典的华严宗。为了说明佛尊能广布圣恩于每一角落,《华严经》就运用了‘幻’的手段:卢舍那佛所住的大莲华台周围有一千片叶子，每一片叶子就是一个世界，每片

叶子的一个世界中都有一个卢舍那佛的化身释迦佛，还有百亿个阎浮提。在这百亿个阎浮提里头各有一个说法的小佛，也是释迦佛的化身。由此看来，世上任何一个角落所发生的事，身居中央的卢舍那佛是无所不晓了。

《大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等是净土宗的圣典,它们一再要求信徒读经时思念佛尊、忆想佛祖。例如阿弥陀佛的非凡相貌就是印度人幻想的创造物。

“光明无量照十方,万寿无疆。阿弥陀佛身亮如树林河产的黄金（阎浮檀金）光色的百千万亿倍，佛的身高是恒河砂子数量的六十万亿亿倍的里程。他眉间的白毫全部向右旋转，就像五座须弥山。他的眼睛像四大海的水，清白分明。周身的毛孔发出光明，像须弥山毫光一样。佛的圆光像百亿三千大千世界，在这圆光中众佛被创造，佛之众多就像恒河砂子一样；每一佛也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菩萨。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每相有八万四千小相，每小相有八万四千光明。每一光明照十方世界,据此摄取和庇护念佛众生,不舍弃一名。’阿弥陀佛有如此无边无际之相貌，怪不得这位慈悲之佛能洞察一切，不仅拯救每一个人，而且拯救每一生灵。反过来说，在这洞察秋毫的目光下，每一信徒敢不检点自己的一言一行吗？敢不积善聚德，以往生净土吗？以“幻”济佛道的方法确实耐人寻味。

当然,我们还可循此径追溯到更早时代。《阿闼婆吠陀》似乎就使用了以‘幻’济道、教化民众勤修善德的方式。例如,该著强调天神伐鲁那(Varuna)的无所不知,任何人都逃不出他的监视，从而迫使凡夫俗子们就范：

大地是伐鲁那王的领域，
广阔而无边的天也是他的。

伐鲁那的腰部就是两个大洋，
但是一滴水就可容纳他的身体。
……
恶人虽然逃逸到很远之地，
但不能逃脱伐鲁那的注意，
他的侦骑自天而下，
以其千万眼巡视着大地。
……
所有存在于天地间及天地外的事物，
都为伐鲁那察觉，
甚至人眼的闪动，
也被他数着。

干脆再从另一位年高德劭的日本名人的著作《翁的文》中摘引一段：

幻术是佛教的特征所在……印度人偏好在讲道时应用幻术，否则将没有信者。所以释迦牟尼必然是一位伟大的幻术师。他六年入山修行的目的是学习这类幻术。一些经书中描述的神变、神通、神力，都暗示了幻术。例如：白毫光造就的三千世界，广长舌伸达梵天，维摩诘方丈内设八万四千弟子座位，神女把舍利佛转换成一位美女等，都不过是幻术。还有，生死流转因果说，本事本生未曾有说，以及其他种种奇妙之说，都是劝诱人们相信这新建立的教义的手段。这就是印度人的教育方式。

当然，考查一下印度人本身的看法，这也是十分有趣的。龙树认为："有一邪恶之人怀嫉妒之意，诽谤说：'佛之智慧无

出于人,但以幻术惑世耳。’于是,佛显出无量神力,无尽智慧,断绝这邪恶之人贡高邪慢之意。’这位佛界圣人接着说“:鸟无翅安能飞翔,菩萨亦如是,无神通波罗密,安能教化众生?”从上述行文来看,龙树仅以褒意的“神通”来驳斥这邪恶之人贬意的‘幻术’,但以‘神通波罗密’(或以中性词‘幻’)济佛道,这看来也是龙树所承认的。

有趣的是,古代一些初来乍到印度的西方人,一则由于他们对奇风异俗的东方风物了解甚少,二则不知道印度人“对幻甚为偏好”,因此他们对于幻想与事实辨别不清,以致以讹传讹,把印度人“幻”的产物,作为实情传给了西方。即便是一些大学者,也不免犯了这类错误,这一结果大既是有意“以幻济道”者始料未及的。例如,公元前 5 世纪上半叶,一位名叫提西亚斯的希腊医生传回了印度虎的模样:“上下颚都有三排牙齿,尾巴顶端长着一些防护用的刺,依靠这些刺,它在近战中保护自己,并放出刺以攻击远距离的敌手,就像弓把箭射出一般。’①

斯特拉波是古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代表作《地理学》堪称为古代地理学巨著,对后世影响甚大,被评价为‘内容全面,资料丰富”。但其中有一段对印度的描述无疑是真“幻”不分。

> 他们说有身高 10 英尺,身阔 6 英尺的人,有些没有鼻子,仅用嘴上的两个出气孔代替鼻子。有故事说,有人就在这些人的耳朵里睡觉。还有一些没有嘴

① J. W. 马克林德尔(J. W. Macrindle):《古典文学中所描述的古代印度》(Ancient India as Decribed in Classical Literature),威斯特敏斯,1901 年。

的人，他们生来温顺，生活在恒河源头周围，靠空气维持生命……

有些地方，黄铜雨从天而降，雨点都是铜的……

印度人的幻想 智慧想必也给中国人带来一份欣喜和享受,因为‘ 孙悟空本领再大,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已是家喻户晓,这手掌之大 的幻想，决非中华土产。

故事世事教义浑然一体

自古以来,宗教在印度社会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各宗教为了向广大民众弘扬教义,想尽了种种办法,以寓言、神话、譬喻及各 类故事，或深入浅出，或由浅入深地启导民众，便是它们惯用的方法之一。这种传教方法多少是印度人的一种特色，因为在印度，寓言、神话等基本上都依附于宗教。而在其他诸民族中,它们大多是独立形式的说教,诸如《伊索寓言》、《丹麦童话》以及中国的神话故事等，都很难说是宗教的附庸。

我们以佛教为例，看一下印度人是如何巧妙地用各类故事生动、形象地阐明教义的。

佛典以一些异乎寻常的自我牺牲和怵目惊心的施舍故事，来强调仁慈和善行，这不能不令人印象深刻。《尸毗王本生》讲述尸毗国王一贯乐善好施，对受苦受难的人们有求必应。他发誓不让一个有求于他的人失望。最后，他为了信守诺言，把自己的双眼挖出来施舍给前来乞讨的瞎眼婆罗门。《尸毗王救鸽命缘起》 故事，讲述尸毗国王看到一只鹰正在攻击一只鸽子，眼看鸽子将成为鹰爪下的牺牲品时，尸毗王挺身而出,要求鹰勿伤鸽子。最后,根据协定,尸毗王割取自己的股肉

喂鹰，以此换取鸽的生命，纵然他痛彻入骨也决无悔意。另一则故事描述了一位僧人以自身喂饿虎，以此光扬慈悲精神(《印度古代文明》)。还有以动物为主角而启示人类应以慈悲为怀的故事，《榕树鹿》讲述鹿王自告奋勇代替孕鹿去死，这令本欲射杀孕鹿的国王大受感动，而后这国王发誓一生将以慈悲为怀，不再狩猎杀生。

佛教徒借用《饿鬼事经》的故事，宣扬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教义。故事讲述那罗陀问一个饿鬼："闪闪金身，照遍四方，却为何故，长有猪嘴。"饿鬼答："信口雌黄，言行不一，因为此故，长出猪嘴。"另一则故事讲述有一僧者，专做好事，经常服侍一癞疮病人，为了让患者高兴，甚至背负他赶集，这令长期以来一直遭人奚落的病人感激不尽。患者发誓来世一定要报答恩人，为了让恩人认出他，他在来世以脸上疤痕为记。果然，这位长者的余生一直由一名脸上有疤的新来弟子左右为伴，即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仍忠心耿耿，寸步不离。

佛教教导人们知恩报恩，同时也鞭挞那些忘恩负义者。《无私心象本生》的故事歌颂了前者。一只大象在林中行走，不慎脚上扎了刺，它请一位木匠帮忙拔出了刺。为了报恩，它日夜帮助木匠干活，而且让自己的小象也来报答恩人。后来外敌入侵，小象奋不顾身冲向前，打退了敌人，保护了恩人。相反《有德象王本生》则告诫人们决不可恩将仇报。德象王在森林密处救了一名迷路的林务官，并小心周到地将他送出密林。然而心怀歹意的林务官却贪财心切，三次割取了德象王的象牙。他的负义行为终于激怒天神，最后遭到了应有的惩罚。尽管其他民族也有这类说教故事，但印度人主要用它们来阐明教义。

佛教的兴起本身，就意味着对婆罗门教义有所不满，因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